

名家文学讲坛

周宪·主编

知性乃道德职责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美国]莱昂内尔·特里林 著

严志军 张沫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ionel Trilling



知性乃道德职责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美国]莱昂内尔·特里林 著

严志军 张沫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ionel Trill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性乃道德职责 / (美) 特里林 (Trilling, L.) 著; 严志军, 张沫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9
(名家文学讲坛 / 周宪主编)
书名原文: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Selected Essays
ISBN 978-7-5447-2045-8

I. ①知… II. ①特… ②严… ③张… III. ①文学理论-文化哲学-研究 IV. ①I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610 号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by Lionel Trilling
Copyright © 2000 by The Estate of Lionel Trilling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Estate of Lionel Trilling
c/o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063号

书 名 知性乃道德职责
作 者 [美国]莱昂内尔·特里林
译 者 严志军 张沫
责任编辑 陈叶
原文出版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625
插 页 2
字 数 524 千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045-8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周宪

自有了人,就有了文学。自有了文学,就有了关于文学的言说。自有了这些言说,人类文明的家园便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瞥见了大千世界。

口传文化时代,人们口口相传谈论文学;印刷文化时代,人们记录下自己的文学感言,付梓出版;今天的电子媒介文化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面临严峻挑战,但文学的话语仍作为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不断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爱,对社会的关切,对人自身的洞察。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策划了“名家文学讲坛”书系。

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实利关怀甚嚣尘上的时期,被冷落了文学涵养及其精神熏陶反倒变得异常重要了。此书系意在收罗国外知名思想家和学者的精彩篇什,展现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由此开启一个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门径。此一讲坛吁请天下文学爱好者们齐聚那里,聆听各路方家坐而论道,发表有关文学的奇思妙想。

我想,此“讲坛”意义毋庸赘言。

作为主编,我诚邀各位读者带着自己的知识行囊上路,在绵延不绝的文字旅程中,去分享那妙不可言的文之悦!

2008年岁末于古城南京

前言

利昂·维泽尔蒂尔

1971年，莱昂内尔·特里林在普渡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主题是他作为批评家的工作生涯。他的演讲具有自传性，而这并不符合他的惯常风格。他的讲稿详细描述了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本科时代。“当时，大学里最伟大的字眼就是知性，”他写道，“我们有一位名师，约翰·厄斯金，他写过一篇文章，其标题成为了我们的行动口号；这篇文章，尤其是它的标题，赢得了如潮的好评：‘知性乃道德职责’。”

令听众感到惊讶的是，特里林表示，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那些充满知性的人群”。相反，“我很依赖直觉；令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具有那种所谓的敏锐素质”。他解释说，他并不希望获得知性，因为这不是小说家必备的素质；他渴望成为小说家，而这份职业要求的“仅仅是善于识别行为和动机的敏锐目光和一颗敏感的心”。当然，在特里林的批评文章中，并没有出现这种关于小说的、颇显不足的观点。1947年，他展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所具备的“知性”素质，其代表作就是《旅程中途》。这部作品用机敏的目光审视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信仰论心理，而且记录了意识形态对人类体验所造成的毁损。（作品描绘了惠特克·ix 钱伯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其手法类似乔治·艾略特的写作风格。）在特里林的一生中，他无时无刻都将自己贡献给知性和知性的事业；我们很难想象他在有生之年竟会说出相反的情形。如果他要赞扬某人，那么他所用的规格最高的词语莫过于“紧迫性”（exigent）和“艰辛性”（strenuous）。然而，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既不具有紧迫性，也不具有艰辛性。无论如何，特里林早期对知性的漠然态度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正如他后来对埃利奥特·科恩所发表的正面评价一样：“他从不装嫩扮小。”）因此，他回忆说，自己很快就“禁不住诱惑，突然开始追求知性，因为当时的哥伦比亚

大学弥漫着这样一种观点——知性与文学是相关的,它得到了文学的促进”。

必须指出,特里林的教授厄斯金并不能永远遵守自己的知性准则。约翰·厄斯金的著作包括小说《格拉海德:一生的经历足以解释他的美名》以及《珀涅罗珀的男人:恋家的本能》,还有一篇特别没有机趣的、具有“厌女症”倾向的文章:《女人的影响——及其纠正方法》。(该文的结尾处出现了一段粗劣的讨论,其中虚构的讨论参与者包括苏格拉底、第欧根尼、希罗多德、伯里克利、卡萨诺瓦,以及安德莱·谢尼埃。)不过厄斯金依然能在美国的人文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作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学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通修的优等生课程,旨在让学生沉浸在那些伟大的书籍之中,而这种教学方法最终也改造了美国的本科教学。“我们没有别的作业,只需要阅读那些伟大的典籍,”特里林在普渡大学的演讲中这样回忆道,“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些著作,而不需借助参考书。”这就是文学经典所引发的兴奋,尤其是这种经典作品:有一段时间,这种兴奋之情达到了高涨的程度,不过特里林仍然会用他惯有的方式来批评这门课,说它“不够具有紧迫性”。1961年,在《党人评论》杂志上,他针对上述课程的自满情绪和“充满喜悦的饶舌机智”发表了著名的批评文章,然而特里林自己的学生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带着这种情绪和机智,体验并反映了他们和现代文学巨著的思想碰撞。(特里林于1931年受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讲师,几年以后,他完成了关于马修·阿诺德的博士论文,并以此为基础于193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同样是在1939年,时任校长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动用“暑期特权策略”,聘任特里林为英文助理教授,使之成为英文系首位具有哥伦比亚长期教职的犹太裔人士。特里林在哥伦比亚执教终生,直至1975年去世。他的一生没有经历过多少外界的变故,但他却成为了研究人类内心事件的权威人物。)

《知性乃道德职责》一文于1914年发表在《希伯特杂志》上。“那种将知性当做威胁的心理,”厄斯金写道,“传承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古老习俗。”这种贬低思想的古老传统具有道德、宗教和情感的基础——即一种古老的观点,它认为“必须在善良和知性之间作出取舍;愚蠢是德行的手足兄弟,而聪慧则是踏入罪恶之门的第一步;理性和上帝水火不相容;

心灵和思想如同两只对立的水桶，在真理这口水井中不断碰撞，形成了一种倔强的平衡势态——具有了完整的思想，却要对应着饥饿的心灵——而具备了健硕的心灵，则要对应着羸弱的头脑”。厄斯金此番断言的目的就在于终结“这种存在于性格和知性之间的特殊纷争”。在厄斯金看来，良知并非来源于英国人的传统，而是发端于日耳曼人的传统；而且它的源头不是思想，而是意志。然而，崇尚知性的派系却在美国成立了。厄斯金宣称，美国人“得以结成统一联盟的基础，是那种古希腊式的、热爱知识的情感，他们相信罪恶和不幸是无知的恶果”。美国人非常理解一个道理，即“如果你想逃离监狱，那么你所需要的是一把打开牢门的钥匙；（而）如果你无法得到它，那你就需要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不是意志的问题——它们是思想的问题。

显然，厄斯金的文章并没有摆脱当时的种族主义特征，而且此文对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小说）中的反知性思想的梳理也远远不够充分。他所构建的美国人的心理生活图景渗透着对专家知识重新燃起的热情，希望知性事业走上专家统治的道路。他用摇摆不定的语调从实用主义的情绪转向了超验主义的情绪，最后，在文章的结尾处给出了一个预言式的结论：“我们寻求知性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希望它能为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带来答案，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知性就是生活——我们也不希望获得帮助，从而让上帝的旨意战胜一切，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知性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热爱知性，正如我们热爱美德，这是出于对它们本质的热爱，同时我们相信，知性只是美德的别名，而且是更为贴切的名称。”

这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赞美，让人感到困惑，而特里林也会因为其中的许多内容而感到反感——尤其是其中的超自然主义特征，尽管特里林承认性格和理解力所具有的崇高属性，而单纯出自自然主义的词汇是无法充分把握这些属性的。（关于艾略特的超自然主义，特里林曾写道：“我用尊敬的语气来谈论它，因为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而理性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必须具备这些因素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而且，特里林坚信，“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必须得到思想的考量，但是目的却不在于产生类似“答案”一般简单而令人振奋的东西。特里林一定对厄斯金论断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兴趣，并在自己所有的批评文章中加以遵循；这些成分就是厄斯金关于思想的固有价值的论断，以及它在心理与道德因素之间

所起的关联作用。这位老师对学生产生了明确无疑的影响,例如,特里林曾于1946年在一篇批评德莱塞的文章中写道:“就我们而言,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理解总是稍显滞后,但正义而混乱的愤怒却一马当先;想法总是姗姗来迟,而幼稚的道德说教却捷足先登。”

特里林从没找到恰当的理由去拖延思考,尽管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在人们热衷的推动下,这些理由层出不穷,以极权主义哲学和极权主义政治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冷酷情感的二十世纪,特里林成为了极权主义最有力的批评者之一。特里林以独特的方式成为自己时代的宿敌。在他的工作中,从来都没有什么唯一的事物:没有唯一的“锁”,也没有唯一的“钥匙”。在心理上,他不知疲倦;在写作中,他处处都显得井然有序;唯一缺乏的,就是休憩。这一点便使特里林成了一位极度避免流于说教的道德家。他对美德的兴趣也包含了对主流的美德观念所持的那种怀疑与尊重并存的态度。至少,他曾用自己对美德的不敬态度为知识界给出了范例。他抨击了许多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他在文章中经常用“我们”这样一个屡屡遭人诟病的字眼——这种态度甚至达到了一种褊狭的地步。然而,这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忧郁而不受好评的美德:让那些和自己同一阵线的人感到不安,“揭去揭秘者自己的面纱”,“反对不同政见者自己所持的正统思想”。

真正意义上的知性生活是一种充满压力的生活。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一种充斥着紧迫性的工作。这些就是特里林所给出的沉重教训。半个世纪之后,每当我们读到《自由的想象》一书那篇字字珠玑的序言,我们总会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部极具影响力的文集出版于1950年,特里林在序言中写道:“一直以来,我觉得那种以自由主义利益作为核心的批评应该发现,它最有力的工作并非在于肯定自由主义的普遍正确性,而是在于对当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观点施加一定的压力。”特里林的抨击态度产生了一种长期的益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充斥着极为兴盛的进步论思潮,特里林对此曾展开论战,其中就包含了关于诚实和爱的关系的教训。他对安逸的指责,远甚于他对错误的指责。他对无畏态度的崇尚,也远甚于他对幸福的崇尚。

天真令他感到厌烦;纯洁遭到他的拒绝;神圣超越了他的接受范围。他信仰的真理就是“复杂性”——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多样性、

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这并非一种理论或方法论。它是一种心态，一种为人师者的顾虑。在特里林的手中，细微的差别成为了传道解惑的工具，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手段。这一点使他的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恼怒。

他总是告诫人们警惕事物的表象，担心没有幻想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虚幻的状态。特里林推崇现代小说的世俗性，认为它们有能力描绘出现实问题和现代生活表象的精确图景。现代小说的主题是社会，或者说是复杂性。特里林认为，社会阶层的多元性催生了意义的多元性，因此不再可能获得确定性，而且以风俗形式出现的表象也作为一种知识状况从而获得了新的声名；现代小说所表现的，正是这些表象。既然小说具有社会性，那么它也具有认识论的特征。这种艺术形式恰好诞生于人类恒定的现实感消亡之时。

特里林的批评实践是一场针对现实感的漫长求索，同时也是对现实感的长期致敬。“几代人之后，当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开始描述我们文化的各种设想时，他一定能发现，‘现实’一词在理解我们的过程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特里林痛恨美国文化以蒙昧主义的方式对现实主义加以利用的做法，“长期以来，美国人相信现实和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而且人们必须加入现实的阵营”。但特里林并不是个具有党派意识的人，无论是哲学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他栖居在一个本质上非常不和谐的世界里。他是一位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不会将现实错当成思想；但他的理想主义还不至于令他将思想错当成现实。相反，他是一位研究关系的学者。

特里林认为现实感是思想最宝贵的成就之一，而且也是最不容易获得的成就。“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他在写于1951年的关于《安娜·卡列宁娜》的前言的结尾处表示，“理解绝对的精神并非困难无比的任务，但精神却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充满着真实而微小事件的现实条件当中，而关于这种精神的了解是非常缺乏的。”特里林极力为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进行辩护，认为他在小说中用许多章节的篇幅去描写主人公寻找栖身公寓的做法是正确的。特里林认为，作者通过这种方式肯定了“受条件制约的现实性，事物的真实性”。他还认为，“失去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失去了一种物质事实，而且意味着失去了一种精神事实，因为精神具有这样一

种事实意义,即它必须存在于一个连找房子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事情都需要精神参与的世界里。”特里林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他也不是一位逃避主义者。作为批评家,他的工作目标就是为纷繁交错的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给出清晰的理解。他丝毫不怀疑这种纠缠状态是亘古不变的,也知道存在的两极永远也不会移位。

然而,清晰——这是加缪竭力倡导人们接受的一种新的斯多葛派理想,它是明确性和勇气的混合体——还不是特里林所指的“思想”一词的全部含义。当他论及思想的时候,他其实说的是理性。确切地说,特里林也许并不喜欢别人将他的视角总结为理性主义。现代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事业并不能真正地令他感到着迷。“讲究理性,重视理智,这本身是件好事,但当我们说一位思想家致力于理性主义时,我们的意图却是要表达一种贬义的评判。它表达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位思想家用一种简单化的方式来思考宇宙和人类,而且它通常表示他的思想发展是基于下列假设的: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似关系。”在现代历史上,理性所导致的灾难比比皆是:功利主义者及其自由主义继承者的理性曾使精神失去了生机,而黑格尔主义者及其极权主义继承者的理性则彻底抹杀了精神。纵观历史,理性经常扮演与想象力和正派行为为敌的角色。它替庸人和凶手解脱了罪责。

同时,理性的敌人也会令特里林倍感厌恶,其程度并不亚于理性的朋友。尤其是特里林晚期的著作,它们构成了一组连续的抨击,旨在批判“当代的非理性意识形态”,他将其称为知识分子逃避责任的行为,并在这个“罪名”下罗列了多条“罪状”：“直觉、灵感、启示;对自我的摧毁——也许是通过沉思,但同时 also 通过狂喜和各种形式的迷醉;暴力;疯狂”;总而言之,都是些直观的罪行。1972年,在《诚与真》一书中,特里林追溯了自狄德罗和黑格尔至马尔库塞和莱恩的“解体意识”历史。特里林经常深入地研究现代文学所蕴涵的那些非道德的或反道德的能量。他承认“敌对文化”——这是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所具有的生命力,而且他本人也是这种敌对文化最有力的(同时也是最具讽刺性的)敌手。

重要的是,特里林对非理性的迷恋态度和他对理性的忠诚态度是紧密相关的。在这方面,他属于最高级别的现代理性主义流派,属于那种思想坚定、头脑清晰的弗洛伊德、托马斯·曼以及以赛亚·伯林的跟随者

(托马斯·曼曾发表反对尼采的评论,认为世界从不会因为过度的理性 xiv 而受到损害)。这些都是具有“夜视功能”的理性主义者。特里林曾警告我们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我们最高尚的愿望当中,仍然存在着危险。”而且他还在善举中寻觅到恶的踪迹,在恶行中寻觅到善的留痕,这些做法其实正是特里林发挥“夜视仪”作用的实例。这些理性主义者将理性的关注视角转向它的对立面,而且他们坚持对无秩序状况的研究,直至理性可以不再畏缩不前。

他们拒绝启蒙运动倡导的那种白昼一般的光明图景,拒绝其中缩手缩脚的理性主义;在启蒙主义者看来,理性是真实存在,或者至少是理智可以承认的所有真实存在。与特里林等人不同的是,他们宣扬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理性主义。这样的理性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在非理性的现实面前,理智的嘲讽不足为敌。这些理性主义者要求理智具备弥尔顿眼中的美德所具备的素质,即理智不能成为研究邪恶过程中的后生晚辈。(在那些具备“夜视”能力的理性主义者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应该是普里莫·列维,因为他真的生活在夜一般的黑暗中。)同样,特里林也坚信,世界并不受我们的思想的左右;他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在以特有的方式惩罚着人类的种种企图——特里林将这种认识称为“道德现实主义”——正是这样的认识才使人类的思想获得了力量和高尚的品质,使之有力量去忍受其自身的软弱,避免因无法控制的因素而陷入落荒而逃的境地。

R. P. 布莱克默曾收集特里林“关于关切和批判”的文章,并以《自由的想象》为题结集出版。在该书的书评中,布莱克默以屈尊施恩的语气将特里林描述为“一位管理思想事务的专家”和“一位在苦海中挣扎的自由主义兼人文主义者”;这种描述给人的感觉是:具备自由主义特征的人文主义毫无荣耀可言,而且世上的所有“海峡”都是风平浪静的。特里林“已经减少了粗鲁的冲动和狂野的洞察力”——布莱克默如此评价道。他的语气更像是在批判,而不是在表达关切。“问题在于,他的精神导师——阿诺德和弗洛伊德——都是思想领域里的极端主义者,这一点使他出现了多虑的状况。”针对这种指责他多虑的批评,特里林应该会乐于接受;但他也应该想知道,面对那些只有通过思考才能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多虑”?

当然,特里林也明白生活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过多的思考。在

他那篇自传性的演讲稿中,他回忆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理性生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思想所触及,或被类似思想的东西所触及。不仅是政治,还包括育儿方法、性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人类生存最核心的部分,这些都受到了思维能力的影响。”显然,他的这番回忆具有犀利的批评意味。特里林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思维能力”(ideation)有点滑稽,而且几乎是一种畸形的现象。“纽约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这些都是特里林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同路人”,他们一起在大都会的环境里尝试着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欧洲和美国、疏离和团结,以及正义和美感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的状态——他们在这方面也是畸形的。他们剥夺了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将文学批评从政治批评中分裂开来,通过这些做法,他们使自己成为了美国知识史上真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经常夸大自己对世界的洞察程度,而且,在他们对“观念”顶礼膜拜的行为中,他们经常忽视观念和观点之间的区别。特里林并没有用纽约知识界特有的方式来夸夸其谈。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文章在纽约知识分子当中是最有持久生命力的。他的写作很有价值,而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中所蕴涵的耐心。他风格中的冷静沉稳是对于生活浑沌属性的痛苦而长期感知的结果。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辩证性质,这就是特里林在面对自己无法迅疾而聪明地理解的事物时,表现出的勤勉的求索态度。

布莱克默有一点是正确的。特里林在思想上的确是一位极端主义者,或者是一位极力拥护思想的极端主义者。这一点表明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局限性。他对形式和审美的机制尤其缺乏兴趣。(他在评论济慈的时候,似乎把济慈也写成了一位知识分子。)他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追求陶醉的感觉。他所受到的训练更多地来自“道德想象力”,而非想象力本身。而且他越来越怀疑艺术。(在他晚年时期,他对卢梭写给达朗贝尔的一封信深表关注。)在文学作品中,特里林主要只关注它们有关观念、情感和价值观的记录。“对我们的时代而言,道德想象力最有效的媒介就是过去两个世纪里诞生的小说。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小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的缺点和失败也比比皆是。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却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在这个方面,特里林是一位非常缺乏文学性的文学批评

家。他关于自己批评职责的观点并不十分专业,而且缺乏游戏性——他思考的范围过于宽泛。他考虑的那些小说和诗歌都是关于他自己的文化的道德历史记载。最终,他成为了一位利用文学材料从事研究的道德史学家,而其中最精湛的研究成果莫过于那篇论及《卡萨玛西玛公主》的杰出文章。

xvi

因此,这里确实没有任何粗鲁或凶野的因素。相反,这里有一种充满哲学和延缓的幸福的气氛,一种充满放弃行为和不停审视的气氛。反讽的意味的确存在于此,但这不是那种浅薄的讥讽。这里还有艺术的成分,它受到知性道德职责的制约。在特里林去世之前,他仍在写一篇关于简·奥斯丁的文章。显然,这位作家的声望在特里林的学生当中有所恢复,对此他感到一丝困惑——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别处发生的学潮运动仍让人记忆犹新——他大胆地产生了这样的希冀:“阅读由一位极具道德想象力的作家所呈现的他人的行为举止,并承认这些行为与自己息息相关,那么他们就已经承担了一种人文主义所尊崇的活动,从中它可以将个体从道德的愚钝状态中拯救出来。”特里林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不过从保留下来的文章片段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写此文的意图就是为了警告我们留心有关生活的美学理想。他采取了一种党派主义的忠诚态度,来面对具有批判性的知性,面对辩证思想的尊严,这一点成为他人人生绝笔的主题:“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去相信,我们在看待生活试图接近艺术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出现了摇摆不定的现象,这一点并不能表明文化的不确定性,相反,这种现象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并具有‘辩证’一词所固有的所有尊严……”如果特里林的教诲能永生不息,那么这种尊严也将长存不灭。

几年前我曾对戴安娜·特里林说过,如果不把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文章发表出来,这将成为触发众怒的事情,于是她邀请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本书正是这一邀请的结果,并成为了对她的答谢。我还收录了关于桑塔亚那的一篇文章《“巴门尼德的微笑令我深思”》,因为特里林曾向妻子戴安娜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希望将该文收入他的选集;不过其他文章的选择都是由我自己作出的。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文章的编排依照它们原先出版的顺序而定。我还要感谢丹尼尔·亚伦·珍妮

弗·布拉德利、亚当·基尔希、布莱恩·菲利普斯、伊丽莎白·西夫顿、德
xvii 雷克·沃尔科特,以及詹姆斯·伍德。

目 录

前言 (利昂·维泽尔蒂尔)	1
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	1
海明威和他的批评者	9
T.S.艾略特的政治思想	20
《不朽颂》	32
吉卜林	62
美国的现实	71
艺术与神经症	88
风俗、道德与小说	106
《金赛报告》	120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137
《卡萨玛西玛公主》	148
华兹华斯与拉比	177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与现代品位的根基	203
作为英雄的诗人：书信中的济慈	225
乔治·奥威尔与关于真理的政治思想	260
目前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	276
《曼斯菲尔德庄园》	293
伊萨克·巴别尔	312
惰性的道德	333
“巴门尼德的微笑令我深思”	342
最后的恋人	356
关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演讲：一次文化事件	374

论教授现代文学	383
利维斯—斯诺之争	404
快乐的命运	428
书信中的詹姆斯·乔伊斯	451
现代世界里的思想	479
艺术、意志与必然性	502
我们为什么读简·奥斯丁的作品	517
附录	535
四十以下	537
《自由的想象》序言	540
《超越文化》序言	545
篇目注释	553
索引	557

《美国》三部曲由三个部分构成——《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赚大钱》——它们各自都十分精彩，而整个系列则更加引人瞩目，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它成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部美国小说，总体而言，它比我们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更为成功。全书没有任何的奇谈怪论；内容正统，令人惊叹；我的这种说法可能会产生一个悖论，那就是它的引人之处恰恰就在于该书陈腐的题材：书中收录了对现代美国生活的种种判断，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多年以来都是靠这些判断来生活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拔高这本书的价值。今天，我们往往会高估文学的重要性，以一种高不可攀的标准来评价作家的作用，认为作家能收纳和解决所有的矛盾，并对作家提出如此的要求。但我们忘记了一点，即从作家的人性角度出发，他很有可能在认识某种孤立真理的时候取得深邃的洞察力，可是在面对其他真理的时候，却相对显得有些盲目，所谓顾此而失彼。我们总期待着出现一个完人，他能告诉我们所有的答案，并产生所谓的“合题”。可是好景不长，这位我们曾欢呼赞颂过的作家——尽管他曾令我们受益匪浅——却依然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于是我们满心失望地抛弃了他，他的功劳被一笔勾销。人们曾高度赞扬过多斯·帕索斯，而现在随着《美国》的完稿，我们却有了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完成，那就是勘定这本书的功能边界，了解它的“有所不为”，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有所为”。

有一点是《美国》三部曲所没有做到的，那就是创新能力；它确认别人的观点，但并不促进观点的发现；它给出总结，但并不给出建议。书中没有个性特点或情感色彩，无法像常人那样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没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发挥这些情感。我认为，没有一位作家会拜多斯·帕索斯为